

ERCHENGLIXUEJIBENFAN
CHOU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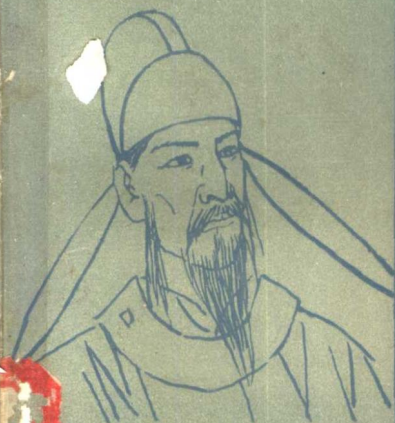
二程理学

基本范畴

研究

刘象彬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1032—1085) 北宋哲学家、教育家。曾
弟程颐字子明效颢，同为北宋理学的奠
者，世称“二程”。

二程理学基本范畴研究 ●

二程理学基本范畴研究

刘 象 彬 著

河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二程理学基本范畴研究

刘 象 彬 著

责任编辑 王进国

•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兰考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75 字数：170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3000

统一书号：2435·006 定价：1.35元

ISBN 7—81018—012—6/B·2

前 言

程颢、程颐（简称二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理所当然地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目前有不少人认为，他们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受到后人的批判，也就根本不值得一谈。实际上，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确实存在着不少合理的因素，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史是作出过一定的贡献的。

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有些人在说到程朱理学时，往往头脑里只有朱熹，没有二程。实际上，二程既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理学的基本原则和骨架，都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确立的，朱熹就是在此基础上把理学推上顶峰的，因而不研究或者不承认二程思想的作用，就无从了解朱熹。那种重朱轻程的态度，是不公正的。

要正确地估价二程的思想，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二程思想的基本范畴入手。列宁曾经指出：范畴是认识之网上的纽结。我们掌握了范畴这样的纽结，就能更准确地了解二程理学的整个思想体系。从二程理学的基本范畴上说，他们对以往哲学的基本范畴有继承，有发展，由此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出不少以往哲学所没有的新思想，从而构成他们的思想体系，为宋明理学奠定基础。我们如果从二程思想体系的实际出发，即从他们自己对自己体系的表述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现代科学所提出的系统论

作为借鉴，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二程思想的核心是由宇宙观和伦理观这两个系统构成的，其中每一个系统又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层次。这些不同层次，又分别由一些范畴作为标志。为此，我就着重探讨了二程思想的基本范畴。

这个小册子题为《二程理学基本范畴研究》。既是“研究”，自然会有商榷之处，目的无非是藉以引起对二程理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研究的深入。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作 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一 二程理学的思想渊源和基本特征.....	(1)
(一) 儒、佛、道不断相互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5)
(二) 二程理学的先驱.....	(9)
(三) 二程理学与儒、佛、道.....	(13)
(四) 二程理学的基本特征.....	(19)
二 二程理学的逻辑结构.....	(25)
(一) 以“倡明道学”为宗旨.....	(25)
(二) “识道以智为先”.....	(30)
(三) “入道以敬为本”.....	(36)
三 理和气.....	(44)
(一) “天下只有一个理”.....	(51)
(二) “万物之始皆气化”.....	(59)
四 天和命.....	(65)
(一) “天所赋为命”.....	(72)
(二) “乐天知命故不忧”.....	(79)
五 性和情.....	(85)
(一) “性即是理”.....	(90)
(二) “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	(94)
(三) “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	(100)
六 心和物.....	(107)

	(一) “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	(111)
	(二) “我之道盖与明道同”	(116)
七	知、学、思	(121)
	(一) “知止于至善”	(121)
	(二) “格物致知”	(124)
	(三) “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	(131)
八	诚和敬	(140)
	(一) “诚后便有物”	(140)
	(二) 敬是“万事之根本”	(146)
	(三) “潜心积虑，优游涵养”	(152)
九	仁	(160)
	(一) “仁是性”	(164)
	(二) “公只是仁之理”	(166)
	(三) “仁道在己”	(169)
十	中庸	(175)
	(一)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180)
	(二) “中庸，天理也”	(185)
十一	理和欲	(190)
	(一) “不是天理，便是私欲”	(194)
	(二) “昏于天理者，嗜欲乱之耳”	(198)
	(三) “灭私欲则天理明”	(202)
十二	变与常	(206)
	(一) “无常而不变之理”	(207)
	(二) “天地之化”，“莫不有常”	(211)
	(三) “巽而动，常久之道”	(215)
	(四) “随时变易，乃常道也”	(219)

十三 对待与交感	(223)
(一) “理必有对待”	(225)
(二) “凡物参和交感则生”	(228)
(三) “天地睽而其事同”	(234)
结束语	(239)

一、二程理学的思想渊源 和基本特征

程颢，字伯淳，生于公元1032年（宋仁宗明道元年），死于公元1085年（宋神宗元丰八年），后人称为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生于公元1033年（宋仁宗明道二年），死于公元1107年（宋徽宗大观元年），后人称为伊川先生。程颢、程颐是同胞兄弟，世称二程。二程祖籍中山博野（今河北正定），其曾祖父程希振死后葬于伊川（今河南伊川县城关），其家遂迁居河南（今洛阳）。二程都是出生于其父亲程珦的任所黄陂县（今湖北黄陂），但一生主要是在洛阳收徒讲学，程颐还在京师给皇帝授过课。由于他们的学识渊博，自成体系，影响很大，后世就称他们的思想和学派为“洛学”。二程的著作，有自著，有弟子的记录，后人编为《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整理为《二程集》出版。

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经指出：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

根据恩格斯所提出的这些原则，研究二程理学，要想真正抓住它的实质，掌握它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具体考察一下它之所以产生的经济政治的背景，考察一下它的思想渊源。

二程理学产生于北宋后期。这时，由北宋初期朝廷鉴于唐末以来大臣武将的擅权和农民起义而导致唐和五代的灭亡的教训，把军权、政权和财权全部收归中央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已经巩固下来。但是，北宋统治者对新的官僚地主实行特别优容的政策：鼓励他们广置田园，免除赋税，保障他们自由兼并土地，等等。这样，到宋真宗时，已经出现大量“兼并之家，侵占众民，凌暴孤寡”的现象。（见《宋史·王嗣宗传》）宋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以至“一邑之财”，十之五六“入于私家”。（见《宋史·食货志》）在这种兼并成风的局面下，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必然会不断地加剧着。与此同时，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北宋统治者迫于辽和西夏的武力威胁，每年要向辽赠送求和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赠送银七万两，绢十五万五千匹，茶三万斤，以求得暂时的苟安。当然，这些负担都要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上，进一步加剧阶级矛盾。据史书记载：到宋仁宗庆历四年，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广西等地，先后都爆发过农民起义，而且“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集》卷四）

对于这样的严重形势，当时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如王安石就隐晦地指出：汉朝亡于“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唐朝亡于“黄巢横行天下”，宋代如再不警惕，亦将重蹈汉唐灭亡的覆辙。（见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为此，他

大力提倡并实行变法革新，企图以此来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

二程也看到了当时形势的严重性。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就指出：“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岁失望，便须流亡。”“今国家财用，常多不足，不足则责于三司，三司责诸路转运。转运何所出？诛剥于民尔。或四方有事，则多非时配卒，毒害尤深。急令诛求，竭民膏血，往往破产亡业，骨肉离散。”“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气上冲于天”。因而“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者乎？”（《二程集》第511、512页。以下引此书只注页数）怎样才能克服这种社会危机？他们也曾为朝廷献计献策，提出过不少办法。如程颐就上过《论十事劄子》，提出应从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等十个方面进行改进。但是，要作到这些，还待于有人去实施，没有人当然不行，人不得力也不行。这些人必须是“贤者”，“得贤者则天下治”（第455页）。因此，根本问题乃是用人问题。

程颐对这个思想讲的更为明白。他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明确指出：“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世不乏贤，顾求之之道如何尔。”（第513页）他在《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中又说：“今言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宽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廩也，备灾害也，修武备也，明教化也。此诚要务，然犹未知其本也。臣以为所尤先者有三焉，请为陛下陈之。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无其用。”（第521页）所谓立志，是说国君应有大志向。所谓责任，是指国君对宰相要信任，

要重用。所谓求贤，是指公卿大夫，百职群僚，都是贤者充当的。三者的关键，就是得贤。得贤，可以帮助国君立志，可以有好宰相和百官。可见，用人问题，是克服当时社会危机的根本问题。

这样，面对着如何克服社会危机以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的严峻现实，二程与王安石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办法，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王安石主张从改革不合时宜的法度入手，实际上是重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因而走上唯物主义道路。二程则着眼于对人的内部精神的锻炼和提高，而忽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因而必然要走上唯心主义道路。当然，这条唯心主义道路，已不可能是以往的唯心主义天命观的简单再现，它必须是一个更加理论化的思想体系。这就需要批判地吸取以往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各种学说的根本观点，加以融会贯通，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二程回答了这一历史要求，他们所建立的理学唯心主义就是这一新的理论体系的结晶。

二程理学是在儒、佛、道三家思想不断相互融合的历史潮流中，在其思想先驱的启迪下，直接体察儒、佛、道的经典的义理中产生的。研究它的思想渊源，有助于了解其思想体系的本质，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哲学发展的规律。

程颐在表述他哥哥程颢的学术成就时说：那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第638页）这当然也适用于他自己。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二程的学术成就，是直接得自于对儒、佛、道各家经典的体会，其中自是以儒为主，兼容佛、道的。至于师承，也是有的，如曾求学于周敦颐；但不是主要的。这种重心得不重师承的情况，

在北宋后期是比较普遍的。如程颐在二十四五岁时与吕希哲一同师事胡瑗。吕看到程的学识好，受到老师称赞，就“首以师礼事焉。”（见第338页）还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三人原来从学于张载，张死后，就改换门庭，又从学于程颐。这就说明，考察二程理学的思想渊源，不应过多的去追求师承关系，而应着重从其思想内容上去探求。

从思想内容上说，二程所创立的理学，又叫做学。由于它强调领会经书中的义理，也叫义理之学。在领会经书的义理时，又特别注重发挥其中关于理和性的思想，所以又叫性理之学。理是全部理学的最高范畴，它派生一切，贯通一切。性是全部理学的中心，“道孰为大？性为大。”（第318页）人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即先天都是善，“性无不善”。圣人能保持住它，才是圣人。一般人受情的干扰，不能把善性发挥出来，必须加强修养锻炼，用持敬、主静的功夫，养成无欲的情操，就会使先天的善性发挥出来，成为圣人。研究二程理学的思想渊源，主要应从他们所主张的道学，所着重发挥的理、性、持敬、主静、无欲等思想中去寻求。应该说这是一条比较妥当的道路。

（一）儒、佛、道不断相互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儒、佛、道在历史上向来是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的。儒与道在先秦时就互不相容，相互攻击。佛教从开始传入中国时起，就受到儒者的攻击，而且长期与儒、道争夺统治地位。由于这三家都能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思想，因而都曾在不同时期

候为不同的统治者所尊崇。当此一家居统治地位时，其他两家就受排挤受打击。斗争有时是很激烈的，弄不好会有灭顶之灾。从斗争的总情况上看，儒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然而，就是在他们的相互斗争中，每一家都竭力抓住对方把柄，进行攻击。而每一方又为了维护自己，就尽力使自己的理论更加完善。在这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既然他们都能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思想，而统治者又要求不断加强自己的精神支柱，就必然促使他们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从而不断融合起来。

早在东汉三国之际，就有牟子作《理惑论》，讲儒、佛、道的一致性。他指出：佛、道都主张“守恬淡之性，观无为之行”（《牟子》二十五章）；佛教徒用父亲财产施舍济人，使父母兄弟来世有好报，是与儒家的仁孝思想完全一致的。（见《牟子》十五章）牟子之所以要这样作，是为了使佛教在中国扎根，不得不运用儒、道思想进行辩解。

东晋时佛教徒道安曾以老子思想解释佛教的“般若学”。他说“诸法本性自无”。他的继承者吉藏对这句话作了这样解释，说：“安公（指道安）明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本无就是指“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均见吉藏《中论疏·因缘品》）这是用《老子》的“有生于无”和玄学的“以无为本”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性空”主张，使佛道一致起来。

隋唐时期儒、佛、道之间的对立非常激烈，而三家相互融合的潮流也更高涨。唐德宗、宣宗倡导举行三教讲论，故然是

要想使他们三家分个高下，但却加速了相互融合的进程。唐代儒、佛、道相互融合的主要事例有：唐初道士李嗣真著《明堂新礼》、《孝经摘要》，孟诜著《家葬礼》、《丧服要》（以上均见《旧唐书·方伎列传》），都是援儒入道，表明道与儒的一致性。而儒者傅奕则援道入儒，著有《老子注》。他在临终时还告诫其儿子说：“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明教，汝宜习之。”（《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九）上述情况表明，礼、孝、名教这些儒家固有的思想，一变而为儒、道共有的思想，儒、道融合有了进一步发展。唐中叶的柳宗元，虽是个著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却也主张儒、佛、道相调合。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说：“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在《送僧浩初序》中说：“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这样，不仅在伦理观上，连性情这些根本问题，儒、佛、道也有一致性。三家的相互融合进一步加深了。

宋代在唐代儒、佛、道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融合。当然，这种融合也是在相互斗争的前提下进行的。在北宋，孙复首先抨击佛老。他说：“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给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乐礼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驾并驱，峙而为三。吁！可怪也。”（《儒辱》）石介接着响应说：“中国道德之所治，礼乐之所施，五常之所被也；然而汗漫

不衍之教行，妖诞幻惑之说满，可怪也。”（《怪说》）他如欧阳修作《本论》三篇，胡寅作《崇正辩》，李觏作《潜书》，皆尽力排佛、老。一时间，形成一股排佛、老的浪潮。佛教徒欲挽救佛教，就提倡儒佛一致。如契嵩著《辅教篇》，表示佛与儒在名教上是一致的。惠洪在《礼契嵩塔诗》中也申明此意，说：“吾道比孔子，譬如掌与拳；展握故有异，要之手则然。”这是说佛与儒是同一只手，只是展握的不同，何必反佛呢？契嵩这一篇文章对于缓和排佛，调和儒佛起了很大作用。据说，一儒者读此文以后说：“初爱其文，终为其理胜而不能夺，排佛之声渐止，而王安石、张商英，如由此归结佛之缘。”（转引自林科棠《宋儒与佛教》）此语难免有些夸大，但王安石罢相后曾转而信佛，曾作《楞严经注》，受到惠洪的称赞，则是事实。张商英亦是儒者转而信佛，曾著有《海眼经》以发挥《楞眼经》的思想，也是事实。此外，达观昙颖曾作《性辩》，以表示佛与儒对性的看法是一致的。大觉怀琏则声称，佛教与尧舜之道是一体的。他在主持一禅院开堂演讲中说：“若向迦叶门下，那得尧风浩荡，舜日高明，野老讴歌，渔人鼓舞。”（参看同上书）这些情况表明，调和儒佛，也是一时的潮流。

由上可知，从汉唐到北宋，儒、佛、道三家是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中实现相互融合的。主张融合的有佛教徒，有道士，也有儒者；其中不仅有唯心主义者，也有唯物主义者。这自然会形成一股历史潮流。当然，主张三家一致的有些说法，是非常牵强的。如说佛、道并不违背孝道，也主张仁爱礼仪，则始终为多数儒者所反对，因而排佛、道的言行此伏彼起，一直不断。但是，对有些根本性问题，如人性本善，只要努力修养

锻炼，都可以成圣成佛成仙，以及尽心知性、主静、寡欲等，三家则是相通的。柳宗元说：浮屠“往往与《易》、《论语》合”，也是指的在根本性问题上，佛与儒有一致的地方。正是这些根本性的观点融汇在一起，再加以提炼升华，就出现了理学。可见，理学的出现，是儒、佛、道不断相互融合的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二程理学的先驱

二程自认为，圣学从孟子死以后，就失传了。直到他兄弟二人直接从儒经那里得到这个不传之学，并加提倡，才使圣学重放光彩。这未免有些夸张。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能于孟子死一千四百年之后重新发扬孔孟之道，也是与有不少先驱者头前开路，积累了大量思想资料分不开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有韩愈、李翱、周敦颐等。

二程曾经指出，汉儒皆未能继承孔孟之道。就连其中的佼佼者如毛萇、董仲舒、杨雄等也是如此。他们说：“汉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杨雄，规模窄狭。道即性也。言性已错，更何所得？”（第7页）所谓“见道不甚分明”，是指对孔孟之道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没有坚决肯定孔孟之道即圣王之道，是千载不易之法。而开始领悟到这一点的是唐代的韩愈。他们说：“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入。至如断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况）与杨（雄）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第5页）又说：“（韩愈的